

文体,也最便于他们表达佛教思想和自家风气。这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僧侣选择这类文体表达自己的心性和教义,是否有着独特的思考和策略?是否真如圆悟克勤所说的是“绕路说禅”、“据款结案”呢?还有就是佛禅的语言,往往是横说竖说,正说反说,显说密说,显示出诡谲的特色,这样的语言策略既不同于庄子的寓言,更不同于儒者之语,而形成这种特色的原因又何在呢?这些都是佛教文学研究中应当关注的问题。辽金元的僧侣作家,虽在文体、语体方面无太多创新,但在解读和分析他们的作品时同样应具备这样的理念和意识。

基督教汉文文学的发展轨迹

宋莉华^①

基督教汉文文学是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特殊文学作品,它们最初是传教士努力消解中西文化差异与隔阂来传播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媒介,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体验的独特表达,后来逐渐融入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清之际百余年间,耶稣会士或译或著的中文书籍,据费赖之(Louis Aloys Pfister)所录约450种,马祖毅《中国翻译史》列出了238种,裴源《明末清初东来耶稣会士翻译著述之研究》列出191种,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则收录了756种中文译著。有关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来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也有一些重要书目,包括:186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编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该书目在每一部著作后都附有简单的提要;1867年出版的 *A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此目后来不断有续编,有上海广协书局1933年、1936年、1938年等版本可供查考。此外,还包括两部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书目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 London, 1884*。墨笃克(John Murdoch)编纂的 *Report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hina, with a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Shanghai: Hoi-lee Press, 1882)也很重要。1901年,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编纂了 *New Classified and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urrent Christian Literature*。该书目又于1907年以同一标题出版了更为详尽的版本。雷振华(George A. Clayton)编纂中文书目《基督圣教出版各书书目汇纂》。此外,还有《协和书局图书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Sold by the Mission Book Company*)以及广学会历年出版的多种《广学会图书目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督教汉文文献已陆续整理出版:方豪影印了《天学初函》,吴相湘主编出版了《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1996年,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S. J.),杜鼎克(Adrian Dudink)教授和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祝平一研究员等人编辑了一套《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由辅仁大学神学院影印出版。2002年钟鸣旦等人又编辑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由台北利氏学社出版。2003年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修订重印了由郑安德编辑的五卷本《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其中收录的文献主要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此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王秀美、任延黎主编的《东传福音》(二十五册)2005年由合肥黄山书社影印出版,收入自唐至民国的文献共380余种,内容涉及景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

^①宋莉华,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上述数据的准确性、文献的完备性姑且不论,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其中的文学类作品展开专门的研究。目前,有关晚明耶稣会士的汉文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台湾学者李奭学的《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论》。该书对明末耶稣会士在汉文著作中,使用欧洲神话、动物寓言、传奇和历史轶事证道进行了详尽的考释,钩稽源流,从文学史和翻译史的角度填补了17世纪中欧文学交流研究的空白。此前,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已经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为该项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另外,朱维之、梁工等学者对基督教文学的研究可谓博大精深,但主要是在世界文学的视阈内讨论基督教文学,对基督教汉文文学仅偶有涉笔。笔者曾著《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一书,不过局限于小说一体,是对西方传教士创作和译述的汉文小说进行的专题研究,缺乏文学史的高度和完整性。实际上西方来华传教士在诗歌、传记文学、游记、祈祷文等文类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遇合,取得了较大进展。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等。近年来,又有新成果不断问世: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上述论著侧重于讨论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对同一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文学活动以及此前传教士们开创性的文学贡献有所忽略。从晚明到新文学运动时期,基督教汉文文学的发展绵延不绝,创作主体由西方来华传教士逐渐转变为中国本土作家,内容由纯粹的宣教文不断扩充为包含了基督教文化元素的各类文学,由此构成了完整的基督教汉文文学史。

在中国语境中的基督教文学与西方有所不同。基督教在中国属于“外来宗教”,一向处于宗教和文化边缘,基督教汉文文学的传播也会遭遇更多文化的、宗教的和社会的阻碍。这也是导致它们长期被学界忽略的重要原因。但是,这部分作品的存在是文学史上不容回避的事实,而且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是从翻译学、方言文学还是白话文学的角度,基督教汉文文学都很有研究价值,为我们重新认识白话文运动进程、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西方文学的早期译介等重要的文学史问题提供了新的文学史料。基督教汉文文学的历史风貌如何?主要包括了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这些基本的文学事实和史料有待厘清。百年来的宗教与文学研究基本上在谈论宗教对文学的影响,但由于对宗教文学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一研究实际上难以深入,只有将宗教文学的历史进程、表达方式和内在思想进行清理之后,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才能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

研究基督教汉文文学的困难首先来自文献的收集不易。其中传教士的汉文文学作品大部分见藏于海外,尤以英、美两国居多,收集不易。而中国基督教徒的文学作品,缺乏系统的整理,散佚严重。其次,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汉文文学创作,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新教传教士汉文文学成就,长期被学界忽略,可资借鉴的成果较少。目前,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西方传教士的汉文著作,主要集中在晚明一段。然而,1807年以来新教传教士在汉文文学创作上体现出了更为灵活的策略,对书籍、期刊的编纂、出版,也更加鼓励,作品蔚为大观,但鲜有学者研究。第三,这一研究的难点还在于其跨学科性。基督教汉文文学既属于文学研究范畴,同时需要对基督教本身以及基督教在华传播和接受的历史、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相当熟悉。这些都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驾驭文献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基督教汉文文学,以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徒撰写、译述的汉文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包括:传递《圣经》启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文学作品;有关《圣经》、教会、教义或基督徒生活的文学作品;基督徒撰写、译述的富于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文体涉及赞美诗、祈祷文、布道文、证道寓言、宣教小说、传记、游记等,时限从1582年利玛窦奉派来华到1917年。基督教汉文文学研究应大致按时间顺序,对这一类作品加以整体观照,凸显其发展脉络,梳理重要的作家、作品,对不同时期、不同文体、语体的功能、题材选择、体例特点、价值取向、美学风貌展开论述,以展现整体面貌和历史轨迹。

“五四”以前的基督教汉文文学发展进程,粗略地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是基督教汉文文学发轫期

在这一阶段,耶稣会士的诗词创作、翻译,证道故事、寓言、神话尤为值得关注,另外传记、汉文小说、游记文学等也有所成就。明万历三十年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圣若撒法始末》是第一部在华译成的西

方小说。利玛窦《畸人十篇》、庞迪我的《七克》、金尼阁《况义》、艾儒略《五十余言》及卫匡国《述友篇》、高一志《则圣十篇》、《童幼教育》、《齐家西学》、《达道纪言》、《譬学》等,都包含了寓言及神话。17世纪还出现了一些由耶稣会士编译的传记,如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的《德行谱》,以及高一志的《圣人行实》和《圣母行实》。1729年马若瑟的章回小说《儒交信》则是最早的传教士白话小说。罗明坚《中国诗集》、艾儒略译《圣梦歌》等反映了传教士的汉诗活动,《熙朝崇正集》、《主制群征·赠言》等则体现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影响。这些作品成为晚明以来中国士人认识西方文学、文化的开端。

(二) 新教传教士来华与基督教汉文文学的蓬勃发展(1807—1850)

首先是《圣经》的翻译。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开始将《圣经》译成汉文,最早的《圣经》汉译者是当时在印度传教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 man)。1822年他翻译的《圣经全书》在印度塞兰坡出版,称《新旧遗诏全书》,即“马士曼译本”。后来,又有马礼逊译本、委办译本、北京译本、施约瑟译本、和合本等中文《圣经》的几大经典。在《圣经》的汉译过程中,始终活跃着一个中国士人群体,李十公、陈老宜、王韬、沈子星等中国文人功不可没。^①对不同时期的《圣经》译本以及不同语体的译本进行梳理、比较,殊有必要。同时,这一时期,传教士的汉文文学创作具有开创意义。在文体、内容、文学语言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在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机结合,努力使之本土化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涌现了书信体小说《诚崇拜类函》等、问答体小说《张远两友相论》、《正邪比较》、《赎罪之道传》、《是非略论》等,及传记文学《古时如氏亚国历代列传》、《约瑟纪略》、《亚伯拉罕纪略》、游记如《大英国统志》等,以及用历史演义的体例来演绎圣经故事、世界历史、国别史的作品,如《古今万国纲鉴》等,并创办中文期刊,其中也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

(三) 基督教汉文文学的繁荣时期(1851—1890)

(1)神诗集的编译出版,如《神诗养心编》、《榕腔神诗》、《神诗合集》等。(2)西方宗教小说大量译介,如《天路历程》、《续天路历程》、《人灵战纪》。(3)儿童喻道故事蔚为大观,如《金屋型仪》、《亨利实录》、《三个闺女》、北美长老会博美瑞译《两可喻言》、《安乐家》、《除霸传》、《孩童故事》、《贫女勒诗嘉》、《晓初训道》、《蒙童训》等多种。(4)汉语方言文学成就引人注目,包括用方言写的小说、祈祷文、宣教书、神诗,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文体之广,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国本土作家。使用的方言则主要是福建方言(以福州土白、厦门土白作品最多)、广东方言(以广州土白作品最多)、吴方言(以上海、宁波土白作品最多,用苏州、杭州土白写成的作品也不少),与南方最重要的几大方言区以及传统方言文学盛行的区域相吻合。在书写系统上,既有使用汉语方言杂字写成的,还采用罗马字符作为方言文学的书写系统,在将各地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同时,与方言土语的口头交流和观念表达之间也形成了有机互动。(5)传记文学的新发展。除了根据《圣经》中国有的人物传记,传教士们为当代的布道英雄、西方的历史名人创作了许多传记作品,如《教士列传》、《近代教士列传》、《国外布道英雄集》、《信心的十二英雄》、《欧洲八大帝王传》、《地球一百名人传》等。

(四) 基督教汉文文学从宗教向世俗的转型(1890—1917)

19世纪末美国掀起的福音运动把大批女性传教士送到中国。到1900年,美国派出的传教士人数已居欧美各国之首。1920年在华外国传教士6636人,其中来自美国的就有3305人,而女性传教士又达2104人。她们之中许多人所受的神学训练是非正规的,并不具备高深的神学知识,而仅仅掌握了一些常识,如有的人只在与宗教有关的学校中选修过一些课程,有的人只上过两年所谓的“圣经学校”,因此她们更像是世俗的教育者而非神学学者和宗教思想家。女性传教士的异军突起,也使得传教士汉文文学的创作悄然发生了变化,宗教色彩不断淡化,而转向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同时创作了许多面向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文学作品。其中,以英国伦敦会的季理斐师母(Mrs. MacGillivray)和美国美以美会的亮乐月(Laura M. White)最为高产,二者分别编译了近20种小说。此外,英国圣公会的杜步西师母(Mrs. H. C. Dubose)和慕雅德夫人(Mrs. A. E. Moule)、美国长老会的费启鸿师母(Mrs. George Field Fitch)等也都著作等身。她们除了自己投身于文学创作和翻译,还通过教会学校、创办期刊锻炼、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编辑、翻译和作

^①参见游斌:《被遗忘的译者:中国士人与中文〈圣经〉的翻译》,载《金陵神学志》2007年第4期。

者,如刘美丽、周澈朗、袁玉英等。这一时期,传教士汉文文学的转向还表现为创办了大量面向儿童和妇女的期刊,刊登文学作品,为提高妇女和儿童的社会地位,改变他们的观念和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

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漫谈

荣光启^①

《中国宗教文学史·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作为一项不小的课题,其意在于为学界提供一部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督徒(正式皈依/入教的作家)的文学创作图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非常关注在这一课题中个体信仰经验、特定历史语境和文学写作自身特征三者之复杂纠结等相关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源于我对当前学界“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些不满足。

1990年代以来,“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这一课题在学术界开始得到重视,仅是学术专著,国内外(中文)已有十余种,如以下著作:[美]路易斯·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王列耀《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王本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丛新强《基督教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季玢《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等。这些研究论著至少凸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1)从文化——文学的维度,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圣经》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促进了哪些因素的改变等重要问题;(2)从宗教/信仰——生命观的角度,以基督教的生命观为参照系,考察和探讨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生命观、生存观方面的问题;(3)以史料搜集为根基,论证了“中国基督教文学”是一种确凿的历史的存在,“中国基督教文学”有着丰富的艺术形态;(4)从文学文体出发,细致地研究基督教文化、《圣经》的因素对中国文学各种文体的影响,考察基督教文化、《圣经》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叙事和语言、感觉和想象等方面的新质素;从汉语的发展角度,考察《圣经》的翻译与白话文运动之关系。

不过,相关著述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如下缺憾:(1)大多数作者对基督教的了解,还是一种笼统的“基督教文化”,对《圣经》缺乏足够的熟悉和一定的理解,对神学范畴内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对教会史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特殊历史语境内的中国教会,更是显得陌生;缺乏对基督教信仰足够的了解,我们很难厘清作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在轻率地比附。(2)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受基督教文化或文明的影响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对这种影响在文学中的表现的描述上,这种文学研究是不是缺乏思想的深度?(3)在“思想的深度”这个层面,确实有作者开始思索现代中国作家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但是,若无一定的神学素养和对宗教信仰的真实体会,在这个层面很难有深度;而有一定神学素养和信仰经验的基督徒学者,在涉及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时,有时显得对这一语境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熟悉。此外,中国的基督徒学者,多属新教的福音派,从基要主义的立场来考察文学问题,会带来一个后果:我们容易辨别一位作家的基督教信仰的程度与真伪,但若不考虑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况,容易将信仰经验与文学表达之间的纠结简化,也对具体历史境况中的作家缺乏应有的同情。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忽视“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课题中,特殊历史语境(包括社会、文化语境)给个体信仰带来的言说困难及这种言说本身的复杂性;(4)尤为重要的是,有信仰经验/真正皈依基督教的作

^①荣光启,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